

●第六卷

苏联年篇作
600 短佳选

苏联
600 篇佳作
选

苏联六十年短篇佳作选

第六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 经 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 印 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60,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ISBN7-5327-0213-8/I·101

定价：5.25 元

目 录

| | | | |
|-----------------|----------|------|-----|
| 奥列格舰上的炮手..... | 沙米亚金作 | 章海陵译 | 1 |
| 牦牛,灰色的,红色的..... | 普拉托夫作 | 吕剑影译 | 18 |
| 和政委在一起..... | 勃罗夫卡作 | 傅石球译 | 30 |
| 铁匠安东..... | 梅纽克作 | 吕剑影译 | 41 |
| 俯瞰河面的小屋..... | 维诺格拉托夫作 | 章海陵译 | 53 |
| 九号病房..... | 穆赫塔尔作 | 章海陵译 | 57 |
| 湛蓝的海..... | 阿依利斯里作 | 章海陵译 | 70 |
| 湿漉漉的雪..... | 索洛乌辛作 | 郭育英译 | 76 |
| 介绍..... | 阿巴扎德作 | 周敏显译 | 100 |
| 手杖..... | 索洛乌辛作 | 曹国维译 | 110 |
| 老的“奥林匹亚”..... | 瓦西里耶夫作 | 卢 龙译 | 122 |
| 继父..... | 科瓦连科作 | 郭育英译 | 146 |
| 走亲家..... | 穆拉特别科夫作 | 周敏显译 | 171 |
| 草原上的暴风雨..... | 齐登达姆巴耶夫作 | 周敏显译 | 190 |
| 园里的菊花早已凋谢..... | 沃罗宁作 徐昌汉 | 宋嗣喜译 | 200 |
| 贝克尔钢琴..... | 安东诺夫作 | 宋嗣喜译 | 205 |
| 芭蕾舞教师..... | 阿洪诺夫作 | 张继馨译 | 234 |
| 一等飞行员库利科夫..... | 扎雷金作 | 荣如德译 | 250 |
| 初恋..... | 沃罗宁作 徐昌汉 | 宋嗣喜译 | 273 |

| | | | | |
|-------------|-------|--------|------|------------|
| 十七点以后 | 帕尔涅夫作 | 徐昌汉 | 宋嗣喜译 | 285 |
| 墙 | | 瓦尔坦作 | 宋嗣喜译 | 303 |
| 普拉思基阿姨 | | 叶菲莫夫作 | 章海陵译 | 322 |
| 分猪肉 | | 卡拉玛佐夫作 | 翁文达译 | 342 |
| 作者简介 | | | | 369 |

奥列格舰上的炮手

沙米亚金

听到战斗警报，我们一跃而起。当时，顿河与伏尔加河流域反革命在发动叛乱，眼前的芬兰湾内德国军舰厚颜无耻地开来开去，在炫耀武力，——尽管时局动荡，我们的巡洋舰却停泊在喀琅施塔得军港内，早已不出海了。我们这些水兵呢，直说了吧，也变得懒懒散散，谁也不相信会遇到海上战斗，说是英国资产阶级既怕我们，也怕德国人，根本不敢闯进芬兰湾来。

凡是受不了军港生活的水兵，都报名参加陆战队，奔赴前线了。

在现有水兵当中挑选指挥员的做法，不能不影响舰上的纪律。我们中间确有那么一些人，认为当务之急是彻底摧毁军官老爷们建立的旧规章，说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天不怕地不怕，勇往直前，把革命烈火迅速燃遍世界。

我们已经觉得生疏的甲板上的警钟声，刹那间惊动了我们。谁也不敢吊儿郎当，个个飞一般地奔跑，——舷梯上急骤的脚步声把巡洋舰的装甲船体震得嗡嗡响。这嗡嗡声象电流似地叩击着我的心，我一步跨五级台阶，登上了炮塔。

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警钟长鸣？敌人打哪儿进攻我们？

前甲板的大口径炮归我指挥，搁在革命前担任这职位得是尉级军官。

水兵向我报告战斗准备已毕。可是军舰死死固定在泊位上，往哪儿打炮？莫非敌人逼近喀琅施塔得了？为什么发动机没有声响？为什么我们不驶到海面上去？水兵们纷纷向我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可我了解的情况并不比他们多。

传来了更加莫名其妙的命令：战斗警报解除。同时又发出信号：立即到甲板集合。顺便说说，列队集合也很久没有举行了，因为有人认为这也是军官老爷们想出来的馊主意。群众大会我们倒经常举行，——一时心血来潮，或者政委一声吆喝，就举行了。

今天谁也没说“旧规章又恢复了”的怪话，而且集合的速度比实行棍棒纪律的革命前要快，甚至比一年前的九月十七日那天还要快。那天，俄国舰只在里加湾游弋，前往莫昂岛的时候，迎面遇上了德国舰队，水兵们不是用装甲船体，而是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德国凯撒皇帝对革命的彼得格勒的进犯。

莫非德国人又出现了？还是彼得格勒市内未被肃清的资产阶级兴风作浪，与伏尔加河地区的反革命叛乱遥相呼应？

目前，巡洋舰上人员不足：好几支武装分队上了前线，还有人承担彼得格勒的治安保卫工作。约莫四百人排成整齐的队列站在甲板上，随时准备跟敌人决一死战。没有一个人说话，但是闪烁的目光流露出难耐的焦虑：发生了什么情况？说吧，政委！

队列前的舷梯扶手后面站着舰长、政委、水兵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以及一个穿便服的人，——显而易见，令人不安的消息就是

他带来的！他们一个个僵板着脸，那表情不象临战的严峻，而是忧心如焚的焦急。

政委开口说话了。他说话一向镇静自若，今天却说得断断续续，仿佛迎面刮来九级大风，他在风中给呛得透不过气来。

“水兵同志们！亲兄弟们！”他可从来没这样称呼过我们，因为他是从工厂调到我们巡洋舰上来的。

这种称呼使得我们越发忐忑不安。

“国际资产阶级、国内反革命势力、卡列金分子、阿历克赛耶夫分子、捷克白匪以及其他反动派，妄图打击我们革命的心脏，打击俄罗斯苏维埃劳动人民的心脏。昨天，他们终于举起了罪恶的手……”说到这儿，政委似乎又透不过气了。

“打列宁了吗？”我忍不住，问道。

崭齐的队形开始动了，乱了。现在，我觉得政委的说话噪音象是从远处透过呼啸的风声和怒涛的咆哮传来：

“是的，打向了列宁同志，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世界革命的领袖。”

“别卖关子，政委！告诉我们：他还活着吗？”有个水兵直着嗓门嚷道。

舷梯扶手后面的那个穿便衣的人退了一步，举起手要大家注意听：

“列宁同志活着！活着！”

大家不约而同地深深舒了一口气。队形马上又变成崭齐的，仿佛听见了“立正”的命令。其实，谁也没喊过这口令，但每个人都在心里执行着。

我们对于各种各样坏消息已经习以为常，例如，前不久莫斯科市内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捷克军团的兵变。但是今天的坏

消息可不是轻轻地震动我们的心，而是打击了我们的心。这极其突然、极其有力的警钟，惊扰的也不只是一艘军舰，而是整个世界！

穿便服的人讲完话，我们的政委开始宣读中央委员会的正式通知。反革命势力这次阴谋的规模不小。我们昨天傍晚就听到乌里茨基被害的消息，各军舰鸣汽笛向这位彼得格勒的契卡委员会^①主席致哀。天黑以后，就在这儿甲板上举行过群众大会。昨天的和今天的事件现在联成了一条完整的链子。

我站在队列里，一边听政委讲话，一边回顾革命成功以来头一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把它们作为一个一个的环节嵌入那根链子。首先，在我的心里，有一天是特别难以忘怀的。

整整八个月前，我承担着守卫斯莫尔尼宫的工作。我有一个心愿，就是有机会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办公室站岗，——我们在私下谈话中，认为这才是重大任务。我渴望从近处看看领袖，如同通常所说的，面对面见到他，如果可以的话，甚至想跟他说说话。在当时，谁个不想跟列宁谈话啊！在列宁办公室门前站过岗的卫兵都说，列宁认得出每一个新来的站岗卫兵，跟他们打招呼，谈话。在此之前，我仅仅从远处见到过列宁。一次是在马林斯基宫听他演讲；一次是从斯莫尔尼宫的窗子里看见他上汽车。可是，值内勤从来也轮不到我，也轮不到我的伙伴。值内勤的是红卫军士兵，而我们水兵只能一般地担任守卫斯莫尔尼宫、电话总局、电报大楼等地的外勤工作。有人曾抱怨，说别的军舰搞叛乱，弄得我们也不被信任了，但我却没这种想法。苏维埃政府各部门所在地的建筑物那么多，要守卫好

① 苏联1917—1922年间的肃反委员会。——译者注

各建筑物难道事情还少吗？电话，电报，——不正是有赖于这些设施，政府和列宁才跟俄罗斯全国保持着联系吗？只有那些粗坯步兵佬才看不出这层关系，而我毕竟读过四年教会小学，在舰队服役过三年。

我不灰心，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在那样的岗位上值勤……见到列宁。

事情发生在新年的头一天。我吃过午饭，到斯莫尔尼宫正门去站岗。这里的岗位很有意思，时间容易打发，因为只有两个卫兵，没情况也不用站在那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什么样儿的都有，——你查看查看他们的通行证，瞧瞧上访者，跟他们聊聊，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这天，我和一位普梯洛夫工厂来的红卫军士兵一起站岗。他和我一样，年纪轻，也很爱闲聊。这儿再顺便提一句，由于彼得格勒市民在过新年，所以上访的人没平时那么多。不过，斯莫尔尼宫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全体工作人员还是上班的。

斯莫尔尼宫的警卫队长和分队长来到正门的台阶上，分队长对我们说：

“小伙子，人放精神些，头昂得高一些，现在我们要接待国际资产阶级了。”

我们都知道，分队长是个乐天派，爱讲笑话，所以我们没有拿他的话当真，哈哈笑了起来。

“您看，他们不相信，也不想跟资产阶级打交道，”分队长嘻嘻地跟警卫队长说，然后又转过身对我们说，“外国资产阶级没有通行证，由我和警卫队长领他们进去。”

我明白了，开始等待有趣而不平凡的事情发生。果真，几分钟后，挂着小旗的黑色轿车一辆跟一辆地朝斯莫尔尼宫驶来，总

共十二辆。我认识各国国旗，——在军舰上学过。我看第一辆车挂的是美国国旗，第二辆车是法国国旗，接下来是英国国旗，瑞士国旗……突然，我想到，来的这些人是大使。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国家拒不承认苏维埃政权，那么大使们究竟想要干什么呢？

穿着高级皮大衣、自尊自大的先生们分别从轿车内钻出来，用本国话咕哝着。

平时，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个个跟我们卫兵打招呼，而这些先生对我们瞧都不瞧就过去了，不过我可是紧紧地盯住他们。我厌恶他们身上的皮大衣，认为在他们的貂皮大衣底下不仅藏着手枪，可能还藏着机关枪。

等到这些先生们在门里消失了，我的同伴，即那个红卫军士兵这才问我：

“他们是些什么人？”

“大使。”

“他们要干吗？”

“鬼知道。”

“会不会是去跟列宁同志祝贺新年啊？”

我笑了。好一个天真的小伙子，居然指望资产阶级会那么有礼貌。

“要到他们承认我们，承认我们革命的时候，才会跟你祝贺新年。再说，根据他们的历法，新年已经过了。”

“他们有他们的历法吗？该死的资产阶级！竟然发明跟别人不一样的历法。”

过去，我们在甲板上听人解释过俄历和公历的区别。至于两者为什么会差一段时间，——其中的奥秘我没弄懂。不过，

我已从苏维埃报纸上看到过，说是俄历落后，是沙皇搞的，不科学；还说，将颁布法令通知改用公历。于是我尽我所知，向自己的工人弟兄解释起来。

小伙子惊诧极了。

“列宁也考虑历法吗？”

“考虑的。”

“什么事儿都要知道，什么事儿都要考虑，得有怎样的一个脑袋呀。”

大使先生们出来了，已没有那种自尊自大的派头，有的甚至把皮大衣的所有纽扣都扣上。他们很激动，大声嚷嚷，象是彼此争论着什么。警卫队长和分队长护送他们出来，而大使们连再见也不说一声。

“什么教养！”我冲着他们的轿车啐了口唾沫。我问分队长，这帮资产阶级想要干什么。

“你们听说了吗？罗马尼亚人包围了我们的部队，抓走了前线军事委员会成员，打死了政委。作为回击，列宁命令把罗马尼亚大使也抓起来，关进彼得罗巴甫洛夫监狱。他们这次来求见列宁，希望能释放那个罗马尼亚大使。”

“妈的，想得倒美！”红卫军士兵火了，“该把他们这帮恶棍统统关起来！他们明明知道，我们的士兵怎样在挨枪子儿！……”

警卫队长笑了：

“你呀，彼得罗，当不了外交家。不过，我倒是真想推荐你去当驻丹麦王国的大使。”

下了岗，我躺在警卫室的地板上，打起瞌睡来。站岗时我给冻坏了。

“警报！”值班卫兵大叫，把我们吵醒了。又出什么事了？警

卫队长(他也是水兵出身)告诉说:谋害列宁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立刻象那天在军舰上的水兵们一样,纷纷问“他活着吗?”,听说子弹没碰着领袖,大家又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马上想到那些大使,——准是他们干的!我把这想法告诉伙伴们,他们也赞成我的看法。大使们成群结队地前来求见列宁不是偶然的,若是请求释放罗马尼亚大使,来一个人就行了。后来我听说,列宁是在离开群众大会的归途中,有人朝他的汽车开了枪。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大使们肯定参与了这一卑劣勾当。

警卫战士闻警而动,加强斯莫尔尼宫里里外外的守卫,以防不测事件发生。因为阴谋家搞什么鬼,人们是无法知道的。

往往喜从天降,你却毫无准备。那天夜里我突然得到我渴望已久的最高荣誉。警卫队分队长命令我和我的伙伴叶美梁·盖依达延柯到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八十一号房间所在的那条走廊去巡逻。趁这机会,可以临时帮帮办公室门前值班卫兵的忙。不仅如此,队长还吩咐:如果列宁回到他的住所去,我们可以跟他到二楼去,在那儿巡逻,检查所有人的通行证。

我们象插翅腾飞似地奔到三楼,可是一到那儿……我们却愣住了。走廊上,人民委员会办公室门前挤满了人,简直水泄不通。说实在的,人群当中有些我是认识的,——他们是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问题是人堆里也可能隐藏着敌人啊,我们怎么办?检查证件吗?我们原先以为这儿不会有人,如果有人来了,紧紧盯住他就是了。可是列宁办公室门前人多得简直象是在举行群众大会。

我和叶美梁一起挤进人群,听到了列宁遭到暗害的详情:敌

人是在方坦卡的桥上向列宁的轿车开枪的。车上和列宁一块儿坐的是瑞士共产党员伯腊丹。枪一响，伯腊丹赶紧按下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脑袋，子弹打断了他的一根指头。如果射击角度再低半寸的话……有人在介绍这情形，大家静得连大气都不出。我直冒冷汗。我脑子里依旧记住那些大使。我很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大家，——可是又不敢，因为在这里还有几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呢，我在群众大会上听他们讲演过。

一个老头儿气喘吁吁地走拢来，看得出，他是跑步登上楼来的。他一边钻进人群，一边问：

“伊里奇在哪儿？”

“在领导人民委员会呢。”

“在领导人民委员会？”老头儿大吃一惊，同时又感到很高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马上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手帕捂住眼睛，然后笑着对大家说：“我知道，我知道，天塌下来也不会使他脱离常轨。天塌下来也不会！列宁就是这样的人！”

我也体会到了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心中的欢乐与骄傲。是的，他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列宁！他刚刚受到人家的枪击，现在却镇定自若地主持着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的会议。

想到这一层，我顿时感到有了信心，就象饱经海上颠簸之苦后又踏上了坚实的陆地。诚然，惊恐和警惕依然留在我心间。不过，我始终没发现列宁办公室门前的人群里有敌人。我相信这里不会有敌人。卑鄙之徒是不敢面对面搏斗的，他们只会从角落里放冷枪。

人们慢慢地散去。正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我们的警卫工作格外仔细，——这一夜我们加强了力量，以防万一。

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开到深夜十点钟左右。委员们散会走

了，而列宁久久没出来。我甚至怀疑自己错过了机会，他离开时我看岔了眼。我向会议室门口的红卫军弟兄投去询问的一瞥：“在里面？”红卫军弟兄也默默地回答我：“在。”

我也说不上为什么，这天晚上竟是那么渴望见伊里奇一面，仿佛见这么一次关系到我的生死，关系到我的命运。我象个姑娘似的沉不住气，在走廊内走来走去，耳朵听到的不是自己的脚步声，而是自己的心跳声。

过了半夜，列宁才走出办公室（后来我才知道，他跟自己的妹妹玛丽娅·伊里尼奇娜和作会议记录的秘书在一起）。

虽说我们一直在等着列宁，可是见到了又慌得不得了。

列宁径直向我和盖依达延柯走来，我们在走廊内脸对脸，背靠墙，直挺挺地站着。其实，连我们自己也感到这姿势太别扭了。原先不是明明吩咐过我们可以流动巡逻吗？唉，真是的！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跟我们打招呼：

“晚上好，同志们，”他忽然收住脚步，仔细打量起我们来，看来他也意识到我们为什么站在这里，不由皱起了眉头，问：“同志们，上级命令你们站在这儿吗？”

我慌了。怎么回答呢？我们从来也没有得到指示，该如何对待这种情况。盖依达延柯倒显得十分伶俐机敏。

“不，列宁同志，我们在查岗呢。”

“那么，站岗的人都在岗位上罗？”

“是的！”

“那么我可以睡安稳觉了？”列宁的两眼快活地闪动着，我们两人都感到他在开玩笑。

“是的，可以睡。”

“你们去睡吧，同志们，夜深了，晚安。”列宁向盖依达延柯伸

出手来，然后又向我伸过手来。

说真的，我心里想，列宁到底不是军人，他不知道卫兵下不下岗只有警卫队长才有权下命令。

我们两人惊呆了，久久地一动不动地站立着。我的伙伴和我一样，右手紧按着自己的胸口。

巡洋舰政委讲话时，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列宁同志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眼前，笑眯眯地握我的手。

也许是我见过领袖，心头保留着他手上的温暖的缘故，所以在当我们听说列宁受了伤，生命受到了威胁的时候，我的情绪显然比别的水兵要来得沉重。

政委慷慨激昂地谈到，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回答反革命的白色恐怖。

当政委等人问谁还要发言时，我第一个出列，简短地说：

“水兵同志们！我提议，由我们巡洋舰派出一支小分队去保卫世界革命的领袖列宁，乌里扬诺夫·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

四百个嗓门齐声呼喊：

“说得对！我们派！”

政委对这条建议倒有点惊慌失措，他竭力解释说，列宁同志跟前已经有一支可靠的警卫队了。谁也没有请求负有战斗任务的巡洋舰派警卫队去，也没有这种思想准备，莫斯科方面不会理解这一举动的。可是，我们不让政委说下去。

“他们一点儿也不可靠！”

“步兵在睡大觉！”

“换了我们水兵弟兄，会用胸膛保护列宁同志的。”

“表决吧，政委！”

“不用表决也清清楚楚！”

“任命达尼拉·舒罗韦茨当小分队队长吧。”

这就是指我。

没有人表示反对。挑选小分队成员挑了很久。因为要选十二个最出色、对革命最忠诚的水兵，所以每人都要经过反复挑选。

小分队拉出去不容易。舰队军委会试图劝阻我们，连军委会的政委也到巡洋舰上来，可是碰上齐心一致的小分队，也只好让步了。他的任何解释都不起作用。当我们乘火车时，尼古拉耶夫车站的警备队队长盯上了我们。不过他也是水兵出身，我们用水兵的行话跟他一说，他马上明白了。一路过去，检查通行证的人员一听我们这些水兵要去哪儿，想干什么，都肃然起敬地不作声了。

我们排成队列，向克里姆林宫大门走去，脚步整齐，马路在我们打了铁掌的水兵靴子底下咚咚地响。

我很激动，因为小分队由我全权负责。我也有点害怕。我天真地想，不会有人阻拦，我们迈着阅兵式步伐一直走进克里姆林宫，马上成为那儿举足轻重的警卫队。无论怎么说，我们将受到亲切而充满感激的欢迎。

不过话再说回来，当我面对巍峨的克里姆林宫时（我初次看见），高昂的情绪马上低落了。我意识到，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干革命，或者用自己的胸膛抵挡敌人射向领袖的子弹，单靠我们这些水兵是不行的。

克里姆林宫的城门口出现了一个红卫军士兵的身影。我们小分队马上呼地散开，围成一堆。红卫军士兵坚决阻止我们前